

## 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探索 ——评刘岳兵教授《“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赵 晓 靓

中日两民族地理接近，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因此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了有关日本的文字记录，东汉班固编著的《汉书·地理志》中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现存世界上关于日本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较之历史记录，中国的日本研究虽然开展得较晚，但也早在明朝就出现了两次日本研究“热”，由于倭寇犯边以及“万历朝鲜之役”的猝发，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将视线投向了东瀛岛国，留下了一批关于日本的研究著作。近代以降，由于中日关系不断震荡，日本研究“热”多次升温，日本研究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增加，研究的质量也不断提升，戴季陶的《日本论》、蒋百里的《日本人》、王芸生编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1949年以后中国的日本研究分别在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展开，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然而，从总体上说尽管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悠久，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但长期以来从研究史出发总结学术传统，反思研究方法的探索之作却是乏善可陈，正如宋成有所言：“日本史研究最急切的任务之一，是尽快推出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著作。……目前国内已出版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著作丰富多彩。然而，由中国学者撰述的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著作，依然阙如。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这个课题依然是一个寂寞的学术空白点，也是一个富矿深藏的创新点”。不仅对于日本史研究，对于整个中国的日本研究而言，无疑都是发人深省的。南开大学刘岳兵教授的《“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正是围绕上述课题所展开的、具有先驱探索意义的一部力作。



刘岳兵教授在著作中细致地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界的日本史研究成果，缅怀了前辈的研究功绩，并且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存在若干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主要有：首先是关于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的探索，刘岳兵教授的意见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回归原典”。也就是“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梳理和解读，去展现思想史所蕴涵的丰富性和各种可能性”，而不是

“先入为主地照搬任何理论、套用任何范式”，因为这样所得出的“不是探求历史的真相”，而只是掩盖了历史真相的结论。很明显，刘岳兵教授是要在思想史研究领域贯彻历史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从而摸索“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路径。在这一重建学术传统的路径中，刘岳兵教授认为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理论先行”的陷阱：“史学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其解释史实范围的广度和阐发历史进程之所以然的深度。一旦离开与史料的真正的肉搏和对史实的辩证，任何史学理论的生气都将丧失殆尽，也很难再发挥任何的积极作用。没有万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史学理论。这样僵化的理论即便被抬出，或许可以一时蒙蔽读者的耳目，但是历史终究会揭穿其面目。在历史研究中，理论先行的做法是探究欲衰退与投机欲增强的表现”。其次是对于构建中国学派的理解。众所周知，构建日本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界的一贯主张，对此刘岳兵教授表示了一定的疑惑和忧虑：“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或创建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或者强调中国学者研究日本要有中国意识、中国眼光，会不会有陷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陷阱之虞？……所谓‘中国的日本史学派’或‘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中提到的要‘突出中国学人的立场、观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不仅令人匪夷所思，而且不言而喻，过分强调某种划一的立场与观点，也与学术研究的本性相悖”。

上述两个问题均为关乎中国日本史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其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如何认识实证研究与理论创新的辩证关系？历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求真”，因此许多历史学者都十分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例如张海鹏指出：“历史研究本质是一项实证研究，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档案等的基础之上，历史研究讲究全面占有史料，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用史料说话。”然而，问题在于历史的长河里有无数朵浪花，历史研究者即便皓首穷经也不可能探究每一朵浪花的“真相”，因此只能做“选择性的探究”，那么，选择的依据何在呢？笔者认为这既涉及研究的目的，也是一个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圣人之道其实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讲体，即君臣、父子、仁义礼智信等万世不变的道德修养；二是讲用，即怎样用儒家的学问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也就是经世济民；最后还有文，指对经、史、子、集各种文献的研究和考辨。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完善个体、建设集体以及探求知识，三者服从且服务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当然，现代人对个体、集体和知识的理解较古人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个体的完善不仅需要道德自律也需要保障权益，对集体的建设不仅要建立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和谐还必须建设人与环境的生态和谐，更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知识的根基在于解释现实范围的广度和阐释其所以然的深度，而不在于是“我们”的还是“别人”的。但尽管有了这些变化，上述三项基本范畴仍然体现了研究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绝非相互割裂、二元对立的，二者统一于服务人类的价值理性，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一个个研究者的具体的问题意识。与之相反，没有了价值理性的统摄，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史料考证都将退化成封闭的学术共同体的智力游戏，丧失面向公众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接下来也许大家还会问：那么上述三项范畴的关系该是一个怎样的结构呢？毋庸讳言，当价值与

价值并列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静止不变，而是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研究者唯有通过一次又一次艰苦细致的研究实践，不断地在价值与价值的张力场中建立起动态的平衡，这，便是研究工作的宿命所在吧。那么，怎样才能具体的研究中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呢？以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朱谦之为例，早在民国时期他便以自己独特的历史哲学为基础，对日本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为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及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朱谦之的理论和方法经历了从历史哲学“分期说”到马克思主义的变化，但最终使他的研究著作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的法宝，是他始终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高度尊重原始资料的实证精神，以及将史料分析与理论运用紧密结合的研究手法。朱谦之的研究较好地诠释了史料挖掘与理论运用的辩证关系，为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开辟了优良的传统。正是基于此，刘岳兵教授提出：“我们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还是应该接着朱谦之讲”，对于建立史料与理论相结合、以实证研究为基础进行理论创新的研究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其二是如何理解建构中国学派？这不仅是日本史学界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史学科要面临的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界就发出了“建构中国学派”的声音，30多年来史学界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许多讨论，既有大胆的诉求，也有质疑和批判。对此，笔者认为如果说中国学派的建构意味着中国史学界提升整体创新能力，为世界史学研究的进步贡献中国力量，那么创建中国学派无疑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与此同时，刘岳兵教授的质疑也提醒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建立中国学派”绝非一个“自我确证”和“自我彰显”的工程，学科创新的前提是切实把握时代的主题和脉搏，挖掘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问题意识，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提炼出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为此，必须具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视野和学科开放的胸怀，融会贯通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切忌以“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自我”和“他者”。只有将中国智慧与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紧紧相连，“中国学派”才有可能屹立于世界史学之林。

刘岳兵教授的著作内容丰富，涉及日本历史、日本思想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多个领域，笔者结合自身的思考从中提炼出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述评和回应。学术观点和方法历来因人而异，勿须定于一尊；通过发掘日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激发学界的广泛思考和深入讨论，为提升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做出贡献，便是此书的根本意义所在吧。

“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

自序 (1)

第一编 “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关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 (3)

从学术·思想史的视点看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若干问题 (7)

“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对中国学界反思自身日本研究得失的一些观察 (19)

日本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感言 (39)

第二编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种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 (57)

第三编 中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 (117)

第四编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典型个案分析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 30 年 (157)

新世纪的神道研究及其他——《日本的宗教与历史思想——以神道为中心》编者的话 (162)

同情及其界限——重读王家骅的《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169)

未名庐学记：卞崇道及其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管窥 (174)

“日本马克思主义”：民国时期中国学界回望 (186)

补编 作为“他者认识”的中国的日本研究如何可能

作为“他者认识”的中国的日本研究如何可能——回顾中国日本研究的相关方法论问题有感 (197)

附录

刘岳兵教授的近代日本儒学研究——评《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及《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吾妻重二) (215)

中国日本学研究推出通史性日本思想史著作 (徐凡) (220)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第一本通史性著作——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讨论会综述 (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 (223)

“理论之后”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刘岳兵博士《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述评 (吴光辉) (229)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读《近代中国的中国观·第三卷(1840-1895)》有感 (白春岩) (236)

人名索引 (243)

后记 (255)